

《給被壓迫者充權的人民歷史書寫》

評論：蒙兆達（標題為編輯所加）

看過了馬老闆及陳景輝的文章，我也有一些回應作補充。馬國明提到，香港市民再一次創造歷史，不過他的論調比較失望，因為這個歷史被扭曲了，並受到當權者的收編。特別在文章較後部份提到一個說法，就是將七一的參加者講成是，市民因為對經濟問題好不滿，民生問題好不滿，因此才上街而已。這些都是跟政治或民主無關，亦與廿三條未必有直接關係。這一種說法我自己當然會認同當權者的論述是一種相當無賴的論述，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會有點戚戚然，因為是否完全與經濟民生無關？當年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是怎樣？如果我們把七一大遊行放回社會脈絡去，站在我的立場，會有不同的詮釋。如果我們只是把七一理解為純粹對人權民主的追求，而與現實中市民正面對的困境無關的話，這裏可能根本就存在著一個空洞化的問題。當回到社會根源又是怎樣？我經常將這個問題從九七年回歸之後的九八年金融危機，來觀看香港整個社會境況的轉變。

事實上，我是覺得九七年回歸之後，九八年金融危機令社會整體資源結構分配或基層市民的待遇狀況帶來一個好大的轉變。而當時發生的狀況，正正是今日我們目睹在希臘、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出現的所謂緊縮政策。如果我們把目光回到九八年之後，當中連續有五年時間，政府是陷入財政赤字之中。政府回應財政赤字的方法是不斷推出緊縮政策，包括先後兩次削減綜援，及在公務員系統內引入合約制及將之

外判，以及加速私營化，也包括停建公營房屋等等。這些問題的而且確在社會上製造了相當大的怨氣和不滿，而這些不滿在七一遊行爆發出來的時候，便完全指向了董建華的無能及政府的管治問題。這些「危機」的轉化，大家可以理解為當經濟危機出現時，政府所面對的困難是它需要作出取捨，它要在繼續滿足市民需要的情況下，是選擇分配資源去滿足市民？還是選擇分配資源去解決資本的危機？或是嘗試舒緩資本累積所面對的問題？當時政府的做法跟好多提出緊縮政策的歐洲國家一樣，都是選擇了偏向資本的利益，透過資源上的重組，再一次向資本傾斜。

所以我們見到，每一次經濟危機出現時，大家的意識形態都是要共渡時艱，而不去了解為何社會會出現問題。但每一次危機之後，每一次的經濟復甦，卻令貧富懸殊不斷地惡化，資本和富有階層手上所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們去探索七一大遊行的社會根源和背景時，我們就會重現一種階級的視角。當我們把七一大遊行放回具體的社會脈絡上時，亦令我們的批判指向壓迫的社會關係及資本的邏輯。

當然，當我看馬國明的文章時，我經常會追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不滿於當權者的歷史書寫時，到底屬於人民的書寫又會是怎樣的書寫？當然我們斷不會理解所謂的人民書寫，就是等同於非當權者及非政府的書寫；那到底一種人民視角的書寫又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況？這個層面上的回應，其實與陳景輝文章上所提到的領導權其實是相關的。陳景輝提到的領導權正正是葛蘭西的分析內的統治者，不單利用武力及軍事來統治國家，也是在利用民間社會內的意識形態來統治國家，是獲得被

統治者同意下的統治。所以這不純是一種強制，而是一種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這一種領導權的說法也是有一種傾向，是把領導權看成是統治者的工具，只是這種工具是獲得同意，而非通過強制而來。但是我們只要從社會運動或階級的角度觀察時，領導權也是一個戰場，一個領導者與被統治者爭奪的戰場。

所以，餘下來的問題是，社會運動和人民運動都需要回答，當我們和統治者抗爭的時候，如果領導權是一個戰場，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怎樣形式的領導權，能令反對運動可以不斷壯大，並由此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以及新的價值？當然，當我們回顧七一大遊行以後十年的變化，其實在某程度上我們都能見到以往主流的意識形態，那種所謂的自由市場萬能，多勞多得的獅子山下精神，或憑個人努力可以出頭等，這些意識形態在金融風暴以後，經過不斷的企業重組又剝削，不斷導致貧富兩極化的政府政策下，已經是越來越少人相信，這一些意識形態是正在逐步瓦解。時間留下了一個空白，在今天我們見到的是右傾本土主義抬頭，某程度上也是在搶奪新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但是在左傾或較注重社會進步主張的觀點上，又如何能在領導權上可以建立另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有助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這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回應的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從近年民間運動的變化中，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以往當經濟危機出現時，往往我們的反抗都是一種本能式的反抗，就是我們要去維護既有的利益和資源不被侵奪。我們要去抵抗當權者的剝削，及對我們的侵犯。但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不論是反高鐵運動還是一些本土保育的運動，或者是紮鐵工潮碼頭工潮等等不

同的工人抗爭，我們的反抗開始不再是defensive的一種反抗，而是我們要爭奪，去改善收入、我們要重奪城市的生活空間。在這些運動中我們可以見到一種對社會未來的構想和想像出來，我們也在這些實踐這些構想中，帶出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及願景。但是這種希望和願景都是模糊而不扎實，這也是剛才所提到當主流意識正逐漸瓦解之際，這些新的較進步的意識形態卻仍未是十分扎實。

回歸剛才我所提到的人民書寫與當權者書寫，從這些我觀察到，當權者的歷史書寫最大的分別在於，這種書寫具有將被統治者去權的傾向，而人民的歷史書寫則有人民充權的傾向。這也提醒了我們自己，從事社會運動抗爭時，我們好容易傾向形容自己為被害的客體。這一種觀點是來自我引用了多年前趙剛的文章，就是「妒恨的政治」。我們好容易傾向理解自己為一種被侵害、被剝削的狀態，但卻不能在運動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所以在許多時候當有人為人民作書寫的時候，在書寫的過程中，表現出他們對被描寫對象——被壓迫被剝削狀況——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的狀況往往把他們描述為無能力反抗的被害客體，這種做法某程度上都是代入了當權者的歷史書寫之中。所以一種新的書寫，人民的歷史書寫將是一種可以令被壓迫者充權的一種書寫。

當然，我提到人民的歷史書寫時，並非指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書寫，也包括一般寫作或新聞報導，因為在很寬鬆的角度看充權的解釋都是歷史書寫。以當權者角度寫出來的故事或報導，就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的角色，又或者嚴格一點，社會運動、人民運動在歷史裡發揮的作用是什麼。正如僱傭條例的出現可能是因為施政者留意到勞

工問題出現，所以立法舒緩社會現狀，而不會指出立法背後原因為六七暴動影響政府的管治危機。又如書本著眼公屋計劃為麥理浩的德政，而看不見人民在其中給予的壓力。若果看日後如何描述最低工資立法，相信也不會提及職工盟組織了多次遊行，又或者是過去十年五一群眾高舉最低工資的旗幟，反而會被說成曾蔭權任內一項回應社會需要的政策。所有這樣的書寫過程都會變成人民無法參與其中亦看不到其作用，而是施政者基於客觀的社會經濟形勢變化作出的政策。一個以這種視角寫出來的故事，我會理解為去權的書寫，是一個代入當權者思維的書寫。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首中提到「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我想當中意義是，在審視歷史時不止單純看見資本家如何不斷剝削工人，而是馬克思的視野中，在社會的演變裡階級抗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因此，歷史從來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歷史，而是資本與工人鬥爭的歷史。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